

安徽省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系列丛书

第一辑

孙德玉◎著

近现代皖籍教育家研究

教育家办学的历史观照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德玉◎著

近现代皖籍教育家研究

教育家办学的历史观照

安徽省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
『近现代皖籍教育家研究』研究成果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皖籍教育家研究：教育家办学的历史观照 /
孙德玉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676-2361-3

I. ①近… II. ①孙… III. ①教育思想—研究—安徽省—近现代 IV. ①G40-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230号

近现代皖籍教育家研究——教育家办学的历史观照

孙德玉 著

策划编辑：王一澜

责任编辑：王一澜

装帧设计：丁奕奕 陈 爽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99千

书 号：ISBN 978-7-5676-2361-3

定 价：5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教育家办学的时代特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作为时下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命题之一，“教育家办学”既为国家高层所重视，又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且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引领性和使命性。如果能够总结出教育家办学的共同特征，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自觉投身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安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教育家，他们的办学思想与实践让人们敬佩不已，值得总结。

近年来，孙德玉教授所带领的团队一直倾心于近现代皖籍教育家研究。他们通过对近现代皖籍教育家的人生脉络和主要思想的系列研究，形成一系列具有区域特色的教育人物品牌研究，为加快推进我省教育现代化提供思想滋养，为安徽打造一批当代“本土教育家”提供行动启示，为身处教育变革时代的教育学人和实践者坚定创新信念提供精神激励。同时，通过对近现代皖籍教育家办学实践的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教育家办学的一些共同的时代特征。

一、执著追求，无私奉献

教育家都是乐于奉献，以奉献才智、培育人才、振兴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特质乃是一名教育家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条件。教育家以教育为职志，将个人的生命价值寄托于教育。而一般教育工作者则计较名利，只注重个人的发展，缺乏对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他们不具备教育家的情怀，更不可能成为教育家。无私的奉献精神乃是教育家的灵魂。这种奉献精神

就是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就是一种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心甘情愿、倾其所有、毫无怨言地勤奋耕耘的精神。如李光炯与安徽无为卢仲农合办安徽旅湘公学，后来因湖南封建势力反扑，在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后因民生艰窘，李光炯痛感安徽的落后，又转向从事职业教育。1912年，他决定将安徽公学改办为安徽实业学堂，设立农、蚕、商等实用学科，以培养经营农业和商业人才。为了办好职校，李光炯擘划经营，极费苦心，一度为募集经费，积劳成疾几至不起。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满时局动荡，再度回归故里，推行“教育不忘救国，教育面向社会”的主张。他呕心沥血创办宏实小学，附设图书馆、成人识字班、妇女班、农场、工厂等，推广乡村教育和职业教育。

二、理念独特，智慧卓越

能否形成融汇时代要求的办学理念，以独特方式为支撑的教育思想，是教育家区别一般教育者的重要标志之一。历数中外成功的教育家，无不拥有独特的办学理念，如吴汝纶所创办的桐城学堂是一所近代新式学校，也是他在近代实施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尝试。吴汝纶在筹办桐城学堂的过程中，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办学文稿，这些文稿凝结了他的诸多思考——如何在中华危亡之际，教育兴国、救亡图存，真实地传递出他的心声——“读西书，识西国深处”于中土。桐城学堂的创办过程，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一代教育家吴汝纶的办学理念与教育追求。这种实践启发我们：独特的办学理念是教育家的重要精神特质。作为教育家，应该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基础上，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明确价值目标的办学精神，这种办学精神有助于形成对于教育教学工作的独到见解和理性思考。独特的办学理念标示着学校是“这一所”，而不是“那一所”。同时，我们应有卓越的教育智慧，鼓足教育干劲，化解各种阻力，把握机遇，不仅要能办学，而且要会办学。

三、理性批判，强烈爱国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教育家都有这样一种特质：他们不受经典和书籍的束缚，不被诸多名人和大家所牵制，不盲从于官僚和权威的论调，而是自由地运用各种知识、学说，辨别其真伪，不断提出创造性的新观点与新理论。教育家既要懂理论又要会实践，他们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与实践不断地总结、概括、提炼，并使之进一步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此，教育家必须有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能熟练用教育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按教育规律办事。理性批判精神是教育家在心智模式上的核心特征，也是教育家在行动方式和价值追寻上的精神来源。这一精神特质在近现代皖籍教育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情怀博大、视野开阔、精神独立，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选择都是成熟的自我意识、反思意识、批判意识的硕果。同时，他们的爱国情感也非常强烈，他们放眼寰宇、胸怀祖国、忧国忧民，又十分善良地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当时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如房秩五虽为党外人士，但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赞同中国共产党爱国爱民的主张。在办学中，他曾多次掩护并支持共产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吸纳烈士子女入学；安排烈士遗孀工作；帮助共产党员教师，如吴克正、黄士元（黄镇）、郑曰仁、张良培等；悼念牺牲的共产党人，如吴克正、王靖疆、陈雪吾等。1968年夏，周总理与浮山中学校友朱铁骨少将谈及安徽的革命往事，盛赞浮山中学：“它是当时那个地区的革命活动的中心。”

近现代皖籍教育家们都是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把教育作为救国图强的首要手段，把办学作为改变民生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是其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而且也反映出他们对教育的社会作用的深刻认识，其进步性应予肯定。

四、勇敢实践，大胆创新

锐意改革，勇于创新，这是教育家的共同特点，也是教育家的核心精

神特质之一。这种实践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遵循教育规律和办学规律基础上，在实践中创新办学路径、方法和手段，把有个性、特色的教育理念转化为独特的办学实践主张。如吴汝纶、房秩五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救国图强，他们破旧立新，勇于实践，大胆提出一些改革封建教育的革新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坚决要求废科举、兴学堂；积极提倡西学，强调“兼包新旧”；亲赴日本考察教育，虚心吸取外国先进的办学经验，并亲自创办了桐城学堂和浮山小学，重视国民基础教育，等等。所有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当时都属于“新的东西”，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开化，而且对我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实践的创新精神并不是盲目的、随意的，它应该具有明确的目标、现实的基础、理论的支撑、科学的依据，这就需要教育家准确把握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客观现实，不断增强问题意识，把教育的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结合起来进行哲学思考，从而发现教育中带有规律性的深层次问题，并找到检验问题的实践路径。

总之，“教育家办学”既是时代的召唤，又是历史的积淀。“教育家办学”这一命题的提出，预示着中国教育将走向一个新时代。尽管目前人们对“教育家办学”的内涵理解尚有分歧，但普遍认为，教育家应当是一种复合型人才，他们集教育理论、教育教学经验、实践体悟以及卓越人格于一身，是教育事业真正的实干家。我们想要认识教育家，应该秉持一颗平常心，对教育家既不要盲目崇拜、敬而远之，也不能随意虚夸、慢而待之。基于此，“教育家办学”体现了教育发展方式从外延发展向内涵提升的转变。“教育家办学”的意义，在于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的人来办学，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质。教育家办学，就是要求办学者能够用专家的眼光去审视教育实际，用先进的理念去引领教育发展，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教育问题，用务实的行动去推展教育工作。教育家应站在社会所需、人民满意和学生发展的高度去规划教育愿景，践行教育理想，实现教育目的，完成教育使命。

把学校交给教育家来办，是教育发展的福音与正道，也是教育发展的

必然诉求。我国的教师教育应勇于承担时代的使命，把培养未来教育家作为义不容辞的理想与担当，努力打造教育家的摇篮。教师教育的目标绝不是造就授业解惑的“教书匠”，而是要造就堪为人师不断创新的教育家。

我相信，《近现代皖籍教育家研究——教育家办学的历史观照》一书的出版，一定会为当代的教育家办学提供历史的镜鉴，也一定会为未来教育家的诞生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朱家存

2016年11月16日

目 录

第一章 吴汝纶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1
一、吴汝纶生平简介及教育实践活动	1
(一)吴汝纶生平简介	1
(二)吴汝纶的教育实践活动	2
二、吴汝纶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6
(一)家学熏陶	6
(二)社会影响	8
三、吴汝纶教育思想体系	10
(一)把教育作为救国图强的首要手段	10
(二)主张熔中、西学于一炉	10
(三)主张废科举、兴学堂	13
(四)主张海外游学,主动吸收外国先进办学经验	15
(五)主动延聘外国教育	17
第二章 房秩五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23
一、房秩五生平简介及教育实践活动	23
(一)房秩五生平简介	23
(二)房秩五的教育实践活动	24
二、房秩五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35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	35
(二)清末民初教育救国思潮的冲击	37
(三)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38
三、房秩五教育思想体系	39
(一)论家庭教育	39
(二)论蒙学教育	48

(三)论中学教育	54
第三章 李光炯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60
一、李光炯生平简介及教育实践活动	60
(一)李光炯生平简介	60
(二)李光炯的教育实践活动	62
二、李光炯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70
(一)“桐城派”文脉的影响	70
(二)吴汝纶教育思想的熏陶	72
(三)先进的教育理念及科学知识的冲击	74
三、李光炯教育思想体系	77
(一)论教育宗旨	78
(二)论中等教育	81
(三)论职业教育	90
(四)论乡村教育	96
第四章 高语罕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105
一、高语罕生平简介及教育实践活动	105
(一)高语罕生平简介	105
(二)高语罕教育实践活动	107
二、高语罕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113
(一)个人因素	113
(二)社会因素	115
三、高语罕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117
(一)早期的改良主义与“教育救国”	117
(二)大革命失败前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救国”	118
(三)大革命失败后的托洛茨基主义	119
(四)贯穿高语罕教育思想的主线:“爱之哲学”	119
四、高语罕教育思想体系	120
(一)论教育的社会作用	120
(二)论教育与人的发展	121
(三)对旧式学校教育的批判	124

(四)论新教育的内容	125
(五)论新教育的方法	131
(六)论教师	133
第五章 张治中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137
一、张治中生平简介及教育实践活动	137
(一)张治中生平简介	137
(二)张治中教育实践活动	139
二、张治中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147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47
(二)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	148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	150
三、张治中教育思想体系	151
(一)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151
(二)论教学	156
(三)论课程设置	162
(四)论道德教育	163
(五)论教师	166
第六章 冯玉祥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169
一、冯玉祥生平简介	169
(一)从出生到弱冠从军(1882—1902)	169
(二)从青年到成年(1902—1916)	169
(三)一个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民主战士(1916—1930)	170
(四)坚持抗日,反对分裂,为国战斗(1930—1948)	171
二、冯玉祥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172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72
(二)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173
(三)清末民初新教育思潮的冲击	174
三、冯玉祥教育思想体系	175
(一)论学校教育	175
(二)论家庭教育	180

(三)论大众教育	184
(四)论军队教育	188
四、冯玉祥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197
第七章 吴承仕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200
一、吴承仕生平简介及教育实践活动	200
(一)吴承仕生平简介	200
(二)吴承仕的教育实践活动	203
二、吴承仕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209
(一)家庭背景	209
(二)社会背景	211
(三)文化背景	212
三、吴承仕教育思想体系	216
(一)论教育目的	216
(二)论教育作用	217
(三)论教育内容	218
(四)论教育原则与方法	221
(五)论教师	228
四、吴承仕教育思想的特色与启示	231
(一)吴承仕教育思想的特色	231
(二)吴承仕教育思想的启示	234
第八章 胡晋接的师范教育实践与思想	238
一、胡晋接生平简介及教育实践活动	238
(一)胡晋接生平简介	238
(二)胡晋接师范教育活动的两个阶段	239
二、胡晋接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240
(一)良好的儒学熏陶	240
(二)徽州传统教育近代变革的影响	241
(三)中学与西学交融的影响	243
三、胡晋接师范教育思想体系	244
(一)论师范教育的宗旨	244

(二)论师范教育的制度建设	245
(三)论师范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252
四、胡晋接师范教育思想的影响和启示	266
(一)胡晋接师范教育思想的影响	266
(二)胡晋接师范教育思想的启示	267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75

第一章 吴汝纶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一、吴汝纶生平简介及教育实践活动

(一)吴汝纶生平简介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今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出生于书香家庭,其父元甲,清咸丰元年(1851)举人,曾在家乡当塾师,被曾国藩聘为家庭教师。吴汝纶家境贫寒,受家庭影响,自幼刻苦好学,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笃好文学,特别喜爱同乡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名家文章。正因为如此,后来他自己也成为桐城派后期的古文学家之一,被时人推崇为“海内文宗”。同时,他是中国近代一位积极兴学、育才并具有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教育改革家。吴汝纶于1865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见到吴汝纶的文章大加赞赏,称吴汝纶是“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的“异材”,于是留佐幕府。其间,吴汝纶得到曾国藩的指教,学问日益精进,与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同被称为“曾门四弟子”。曾国藩去世后,吴汝纶转入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幕府。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当时都是清廷权臣,朝政大计多取决于他们二人,而他们的奏章疏折又多出自吴汝纶之手。

吴汝纶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州市)、冀州(今河北冀州市)知州,并在两州开办书院,亲为讲授。后辞官,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赴日本考察学制。是年冬,乞假回乡,创办桐城学堂(该校自成立后几易其名。为不致混淆,本书中凡提到该校,统一使用“桐城学堂”一名)。次年(1903)春,桐城学堂规模甫就,吴汝纶积劳成疾,溘然辞世,终年六十四岁。

(二)吴汝纶的教育实践活动

1.宽经费、延名师，振兴地方教育事业

吴汝纶在清同治十年(1871)至十二年(1873)曾任深州知州，清光绪七年(1881)任冀州知州。吴汝纶先后出任深州、冀州知州十多年。他在深州任上，发现那里的学田被豪强霸占，教育经费无着，他不畏权势，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三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至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吴汝纶在深州任内因父母丧事返回原籍。期满后改任冀州知州，仍然锐意兴学。因此，深、冀两州文教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他在为政期间，还注意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他在冀州时，经常邀请当地贤达讨论地方事宜，不仅使滏阳河千亩贫瘠的卤田变成膏腴的良田，而且便利了商旅交通，受到人们的称赞。

2.主莲池、倡西学，创办新式学堂，开风气之先

清光绪十四年(1888)，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教习，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冀州知州，担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吴汝纶就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达十四年之久。他在主持莲池书院之初，以学生举业为工作重点，其主旨是为科举服务。甲午战争以后，吴汝纶开始怀疑科举制度的内容和效果，于是他在这所古老的书院中开始了对教育改革最初的探索与尝试。吴汝纶一心主张汉语，认为汉语是天地间最精粹的语言文字，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优秀文化。说到实用，吴汝纶崇尚欧美新学，认为博物、格致、机械方面的知识，一定要向欧美学习；学会了欧美的优点，才能和他们竞争。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在这里，他最大的实践就是先后开设了英文和日文两个学堂，并且从美国、日本聘请了教习，把学习英文和日本作为与古文和举业同等重要来对待。他还亲自筹措经费、组织授课。同时，他购买新式图书，组织学生讨论时局。因此，国内慕名前来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过其教益。当时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吴汝纶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

了解。通过对欧美及日本的近代教育的分析和总结，吴汝纶认识到创办新型学校的重要性，认为培养和造就新式人才是当务之急，并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想法。

3. 东渡日本考察学务，描绘清末教育改革蓝图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诏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吴汝纶坚辞不就，未获批准，于是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因为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向日本借鉴。于是，他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吴汝纶及其弟子在回国前将他们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教育的专著。他们的考察报告为制定“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中关于师范学堂的章程提供了蓝本。1904年颁布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就是在参考了《东游丛录》的基础上，以明治日本师范教育制度为模板而制定的，内容包括：确立涵盖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这样两个层次规范、比较完备的师范教育体系；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属中等教育阶段，优级师范学堂属高等教育阶段；设计优级师范学堂须附设中、小学堂，以为学生教学实习之用；规范小学师资培养机构除初级师范学堂外，还可设立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习教员讲习所。这标志着中国第一次确立了独立的师范教育制度，对教师的培养进入了专门化、制度化的阶段。

4. 爱家乡，重教育，创办桐城学堂，培养新型人才

吴汝纶创建桐城学堂最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关爱桑梓，希望回馈家乡。在家乡创立新学堂，是吴汝纶的夙愿。吴汝纶虽身在异地为官，但时刻关心故乡的发展，特别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主政深、冀两州时，看到北方人才辈出，欣喜之余，难免为家乡教育的落后而痛心。他既对安徽难开兴学之风大惑不解，同时更感焦虑不安。这在他与皖籍同僚、贤达、乡绅的通信中时有流露。戊戌政变后，他多次与桐城马通伯等人于书信中商谈创办学堂事宜。他在1899年给方伦叔的信中问道：“马通伯前有公

呈，改办桐城学堂，其事如何？皖中风气难开，其议想成画饼耳。时局如此，将来西学必兴，先学先得利，皖中孤陋，事事落人后，亦其宜也。马议不行，执事在省，当与同志诸公商办一学堂……”^{[1][71]}在吴汝纶的直接推动下，筹办桐城学堂之事几年之间便有了很大进展。吴汝纶希望能实践其“为天下人才谋”的雄心壮志，多次写信给桐城县官员及各界人士，申述办新学的意义和拟在家乡兴办学堂的设想。吴汝纶在访日结束回国以前，心目中就有了新式学堂的大体雏形，即创办一所速成专科，为社会开化和传播新学培养人才。吴汝纶在访日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创办桐城学堂，经过四处奔波，多方洽谈、交涉，终于解决了场地和经费问题。吴汝纶寓居省城安庆时，借巡抚衙门南院筹建了桐城学堂。他亲自拟定办学章程及襄助学务的人选，自任桐城学堂堂长。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他回桐城勘定学堂校址，除延聘国内知名学者任教师外，还聘请日本学者早川新次来学堂教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新学课程。他为学堂亲自撰写了楹联和匾额，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为“勉成国器”，表明了他育才兴国的抱负、办学思想以及对乡里学子所寄予的希望。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安得东西并一堂”理念的一次重大实践，是他倾心力兴学重教的结晶。

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的动因之二是振兴教育，培育新式人才。在吴汝纶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人才辈出，就在于其教育先进，学校林立。所以，他认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理想场所。他认为，“兵战”“商战”并不是强国御侮的根本大计，必须兴学堂、育人才、提高国民素质，这才是振兴民族之基。在他看来，中国所谓“人才奇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士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只会做堆砌骈偶华丽辞藻的文章，非经国济民之才，更不是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无法满足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需求。故此，他认为：培养和造就新式人才为当务之急，必须举国上下广立学堂，振兴教育。

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的动因之三是新学不兴，旧学难废。1897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今国家若徒托空言，并不真兴西学，则蒙不敢知；若诚欲造就人才，以收实效，则不得但设三数西学而止，势必使各行